

被逼出来的也要纠正

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广大党员干部都能按照中央要求,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对自身存在的缺点不足和不正之风进行深刻剖析,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群众普遍欢迎。

然而,我们在采访中也发现,有些同志在剖析自身或单位不正之风的原因时感叹:我也恨不正之风,但有时是被逼无奈、不搞不行呀!逢年过节你不向有关的权力部门表示表示,人家就会想法子卡你;年终检查,你不向检查团

的成员意思意思,你工作成绩再好,也可能拿不到先进;你不让人家走“后门”,人家就会找各种理由堵你的“前门”……至于说公款大吃大喝,有人竟总结出三个“不得不喝”:上级来检查,为撑“面子”不得不喝;下基层考察,为了“不取”基层热情不得不喝;酒桌上人人都喝,怕自己成“另类”而不得不喝。

由此看来,这些人所搞的不正之风,好像是不得已而为之,可谓是“被不正之风逼出来的不正之风”。不过,真正的硬汉是不怕“逼”的,哪怕刀架在脖子上也是脸不变色心不跳。在这些硬汉眼里,反对不正之风,不因被別人

“逼”而屈服,或许在个人利益上会受到一些“损失”,或许会被别人说是“不近人情”,或许会暂时“失去”一些朋友,但在道义上却得到了自慰,人格得到了提升,尊严得到了维护,思想得到了纯洁。而经人家一“逼”就软下去的人,究其原因,无非是怕被穿“小鞋”、“吃”“闷棍”、失选票、丢利益,于是面对不正之风的侵袭,能退则退、能让则让、能躲则躲、能避则避,实在退让不掉、躲避不开,也就随波逐流,“不情愿”地搞起一些不正之风。

从表面上来看,这些“被逼出来的不正之风”与那些热衷于搞不正之风的

大不一样,仿佛是情有可原,但从其后果和影响来说,二者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被逼出来的不正之风”也同样有恃的性质,与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也是背道而驰的,也同样损害着人民利益,毒化着社会风气,败坏着党的形象。因此,对这种所谓的“被逼出来的不正之风”,也不应宽恕和原谅,也要深刻剖析原因,彻底予以纠正,决不能搞“网开一面”,更不能搞“下不为例”。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干部通过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夯实宗旨观念,进一步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价值观。

袁文良

23日上午,“2014书香岭南”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广图举行。启动仪式上,广东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广东省构建全民阅读体系调研报告》。报告称,全国人均每天读书不到14分钟。(4月24日《新快报》)

书籍是可栖居的精神家园

面对书,就是面对人。哲学家笛卡尔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可以说,在书籍里躺着过去的一切灵魂,只要人的眼睛、人的理智碰触了书,白纸黑字上的灵魂就会活起来,站在你的眼前。书是世间最好的东西:无用之用。一本好书对一个人的成长乃至其一生,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读书就是生活,是个人生活。一些人不爱读书,是这些人从来就没养成读书习惯。读书也是民族的生活。有不爱读书的族群,就会有嗜书如命的族群。犹太人酷爱读书,这是自古远而来的佳话。因而,这个族群被称为“读书的民族”、“教育的民族”、“记忆的民族”。犹太人自信于自己的读书,享受读书的过程。那里是书乡社会,特拉维夫市到处都是书店,繁华之处书店往往也最多。在海边,在公园,在公交车上,有很多静静看书的人。在战争与和平的命运中,给人最深的记忆是那里的青枝绿叶一样的书香世界。

读书需凝神静气,最高平和心态,而在一种浮躁的环境中,人们目光短浅,天天忙着拉关系挣钱,常跑书店的人、手不释卷的人甚至会被视为不太正常的人。而那些贫乏地扫视一下文字的人,除了瞄几眼“鸡汤类”,就翻一翻“养生类”,再就是教人怎样勾心斗角的“官场类”。

一个人的精神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准。一个族群,多少人在看书,哪些人在看书,看的是些什么书,决定着这个族群的未来。不爱读书的族群,是落后的族群,不文明的族群,没有希望希望的族群。

人均每天读书不到14分钟,从个人方面说,主要还是源自于缺乏阅读习惯而产生的阅读惰性。还是多读书吧,多花些时间放在上面,不是件吃亏的事情。从纷扰中喧嚣中回到清静的书里,就是回到了诗意般可以栖居的精神家园。

今语

仅倡议“无手机”课堂还远远不够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自从智能手机普及以来,老师在讲台上口舌操劳讲课时,学生却在下面低头玩手机,这一现象越来越严重。今年3月,浙江工业大学面向大一学生发起课堂“无手机”倡议。

据了解,这个倡议旨在鼓励学生将手机隔绝在课堂之外,恪守课堂新公约。这一做法引发全国多所高校的关注,也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当手机越来越成为“必需品”的当下,课堂“无手机”是否是治疗“手机综合症”的一味良药,恐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不可否认,浙工大对这种现象说“不”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大学课堂成“手机上网综合症”重灾区,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患有“手机上网综合症”的学生已经严重依赖手机上网,具备手机上网,并且占据了学习和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校园里,起床刷微博、自习看“人人”、路上淘商城的现象随处可见,课堂上的“低头族”也随之出现。手机对他们的改变是巨大的,甚至已经傻傻分不清在什么样的场合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使用手机上网做的事情往往跟教学目标无关,只是把手机当做无聊的消遣。所以,这样的现状必须改变。

课堂教学改革一直是学校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浙工大发起课堂“无手机”倡议体现了教育工作者对学生出现课堂的敏感和及时关注,也是对课堂教学秩序的一种积极的维护和改革。坦言之,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不足为奇,尤其是个体意识正在迅速成长的大学生。但是,大学课堂成“手机上网综合症”重灾区表明,这已经不是一个个别现象和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是影响甚广的干扰传统课堂教学秩序的“集体行为”。没有良好的教学秩序,何以保证教学质量 and 教学成果。

也许有人质疑,课堂“无手机”治标不治本,关键还是上课内容不吸引人,不玩手机还会有其他东西转移注意力,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手机在课堂上也很有用处,不能一棒子打死。这样的声音仔细思量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学生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任课老师是否也缺乏课堂管理的能力,这是我们同样应该反思和改进的目标。

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入已经习惯通过手机接收信息,这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任何改革都应基于这种认识之上,顺应并推动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的。所以,课堂“无手机”是否真能让手机远离“手机综合症”,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仍需要时间的检验。但是,让学生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习惯是势在必行的。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在如何积极地教育、引导学生提升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方面,在如何让手机“受害为利”、服务教学方面,我们的教育工作者还可以进行更多有益的探索。

宋华

跪求

江苏省淮安市柴米河为区域主要排涝河道,河道两边居住着大量居民。据村民反映,柴米河最近几年河水越来越脏,发绿的河水常年散发着阵阵怪味。4月25日,江苏省政风热线直播走进淮安。住在河边的陈女士带着一瓶河水走进了直播现场,并当场向环保局局长下跪,请求尽快治理柴米河污染问题。

焦海洋/图



布鞋院士走红的意味

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不为浮名所累,专心于事业;光脚布鞋,似假地僧,喜好喝酒,二锅头不离身。在中国遥感领域,他是第一个在国际上享盛誉的人。种种情怀,种种表现,让李小文院士一夜走红网络。很多网友觉得他是:“一个沉默、不起眼的人,却有着惊人天分和盖世神功。”(4月25日《成都商报》)

实际上,民国时期,西南联大就多有李小文院士这样的人。种种情怀,种种表现,人们从他身上看到的,都是久违了的知识分子的风度与风骨。或者一种“范儿”的东西。

金岳霖先生,原来的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及创办人。他的《知识论》享誉国际。金先生因为眼病的缘故,帽子终年不脱,一副

眼镜一白一黑。曾昭抡先生,原来的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教育有机化学等课。但他又擅长分析时事,所写时评,比之专业人士毫无愧色,且“贯彻始终”地跟学生一道吃,玩,闹。沈有鼎先生,是哲学系一位年轻教授,抗战以后才从德国回来,对于小吃极有兴趣,上至“米线”下至通心糕模样的,他都光顾,并且有时拿着大摇大摆,缓行过市,优游自在。沈先生不修边幅,在民国三十三年度整一年中,一直到应聘赴剑桥讲学,一件夹袍无论寒暑就从来没有换过。

在看惯了装这装那的时代里,李小文院士的自我形象是彻底的不装。他的朴素、朴实,不仅是个性使然,还因为他对世事了然于胸,更愿意服从于自己的内心,按天性、偏好去生活。

确乎态度决定一切。李小文院士的一切所为都由他的人生态度所决定。像李小文院士这样的纯粹的学者往往都是痴人傻人,不随波逐流的人,淡泊名利的人,特立独行的人,精神自由的人。在浮躁、浮躁社会层层包围中,他是清新的学问已装得满满的,再也盛不下多余的虚名浮利。“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社会上还多有这样内心强大的自然之子,这样的人的存在,强在是一息尚存的传统之幸、文明之幸。

不管怎么说,李小文院士突然在网络世界走红是件好事。因为,多一些人崇尚文化、崇尚纯粹,总比拜金媚权要好,总比崇尚那些深厌于人性、深厌于理性的各类言不由衷的说教要好。 伊文

质疑分时免票 不如推广“嵩县模式”

4月25日,嵩县旅游局发布消息称,从5月1日起至10月31日,嵩县4个景区白云山、天池山、木札岭和卧龙湾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门票免票活动。但根据分时段对城市游客优惠政策,河南的城市在“五一”期间不能享受免票优惠,这项政策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认为,在五一假期分时段、分对城市的优惠,有失公平。(4月27日《法制晚报》)

2012年10月,嵩县首次推出景区免票优惠导致客流“井喷”,首个周末就有数千游客滞留,有关部门时将近一天才将游客疏散完毕。通过反思,嵩县从去年起调整策略,实行分时段、分区域免票,每个阶段针对一个河南城市和一个外地省市进行优惠。

从宏观层面来说,分时免票是个不错的主意,通过经济杠杆引导错峰出行,既满足游客观光诉求,又兼顾景区接待能力。不

过,具体到微观层面,这种免票模式又难免陷入“众口难调”的尴尬。比如,有的游客希望去嵩县看秋景,但所在城市却恰恰安排在夏天。有的省份放在上半年优惠,但一些游客却下半年有空。至于五一、十一等“香饽饽”,更是注定了安排哪座城市和哪个省份,都会遭遇其他地方人们的质疑,被扣上地域歧视的帽子。

分时免票惹争议,固然有政策本身不够完美的因素,但更关键的还在于公众旅游意愿强烈和景区免票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与日本富士山、韩国汉拿山等著名景区免票不同的是,中国绝大多数景区仍依赖门票经济,国家旅游局公布的国内136家5A级景区中,票价不高于200元的94家,有26家达到或超过了200元,一个人玩遍这些5A景区要花19085元。景区太贵“玩不起”,让公众对于免票的诉求日渐强烈,而像

嵩县这样大规模、常态化免票的景区仍是凤毛麟角。

对于“免票有风险为何继续推进”的疑问,嵩县旅游局负责人表示,旅游市场在转型,主要是想探索一条新路子。诚如斯言,作为免票政策的坚定探索者,嵩县不应承受太多的指责和批评。试想,如果嵩县在首次免票遭遇游客滞留后,以条件不成熟为由放弃尝试,今天也就不会置于舆论风口浪尖,但于公众而言有何益处呢?纵然有瑕疵,分时免票不失为一种大胆的尝试,应该值得鼓励。

与其苛责分时免票不公,不如推广嵩县模式,引导更多的地方效仿,让免票景区不再稀缺。到那时,不劳景区搞什么分时段限制,市场会自然分流。本地和周边地区游客主动利用周末等时段游玩,不再和远道而来的外地游客一起争抢“黄金周”。张枫逸

官员退出制还须精细化

有媒体报道,据统计,近8年来,广州市共有11位处级以上官员下海,其中8人出自城建系统,曾长期在国土、规划、建设部门任职或分管城建工作,7人选择进入房企任职。尽管下海的官员还是少数,但“对口下海”的现象却已经萌生苗头,值得我们警惕。一般来说,高级别的官员下海,当然也不是从基层做起,直接空降管理层并不罕见。2010年便有媒体统计发现,前后有23名证监会官员下海出任了34家上市公司的高管。由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相对透明,不难估算哪些尚未有大白天下的“对口下海”,数目肯定不止这么一点。

有人说了,官员在任职时不该为个别企业谋福利,但下海了之后脱离行政体系,谁也没资格管。这种看法听起来颇有道理,却完全忽略了官员下海的本质。企业看重下海官员的哪些素质?当然,不否认一些官员有经验有能力,是企业需要的人才。但依附在官员身份上的种种无形资源,可能才是让企业趋之若鹜的根本因素。企业要打通政商关系,向在任的官员“公关”属于违法乱纪,风险太高,相对来说瞄准下海的官员,隐蔽性就强多了。而官员到了下海之时,不少都已居于领

导位置,哪怕去职后权力没了,但人脉还在,人情还在,为企业办事事情相对容易。

如果说普通人在不同企业间跳槽,凭的是自身的知识、经验和水平,官员下海后的“核心竞争力”却往往并非通过努力获得的能力。官场说“屁股决定脑袋”,其实屁股也决定资源,对这种看中资源形成的利益交换尤其要注意。

其实,公务员法早有明确规定,领导成员离职3年内,其他人离职2年内,不得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但撇开这个3年期限合不合理不谈,这一白纸黑字的规定在愈演愈烈的“对口下海”现象面前,早已不攻自破。看得见的违规行为,为何没人来管?在法律法规进一步细化的同时,还应严格调查官员下海后的违规行为。

近年来,不少官员感叹“为官不易”,这或许是一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娇嗔,但也引起了我们对于官员退出机制的思考。随着权力一步步被关进制度的笼子,官员在体制内将权力变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对口下海或许又成为贪腐官员的新“蓝海”。

董门仁

“净网”需要社会合力

中央主要新闻单位积极响应,基础电信运营企业认真清理,商业网站主动开展自查自纠,教育系统号召学校家长学生一起行动,行业协会、社会团体也纷纷出手……“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不但以高压态势严肃处理了超过法律红线的违法机构和人员,而且充分调动起各行各业共同抵制淫秽色情信息积极性。连日来,一批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网站被查处,行动成效显著。事实证明,欲将“净网”行动进行到底、常抓不懈,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网络空间广大,拥有海量信息,要想实现对有害信息“治标治本”一起抓、网上网下一起查、老虎苍蝇一起打”的目标,仅靠执法、监管部门的力量远远不够。有关部门只能在制定法律法规、严惩违法

行为的“两头”上下功夫,而发现新动向、新苗头,有效铲除其滋生土壤,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对有害信息围追堵截。互联网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拒绝“带脏”的浏览量 and 点击率;相关行业要协同自律、自查自纠,维护市场秩序;教育系统要加强指导,帮助家长学生趋利避害;社会组织也应自觉行动,在宣传教育、社区活动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执法、监管部门不仅要有害信息一律立案查办、斩草除根,做到除恶务尽,还要善于同企业、行业、民间团体对接合作,确保群众反映和举报不良信息的渠道畅通,并建立长效机制,凝聚社会合力,让各种有害信息一露头就挨打,无处遁形,让清新、健康的网络空间惠及每一个人。

经文

为“舌尖上的中国”腾个地方

《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来袭,让世界各地的吃货们大呼过瘾。与此同时,“舌尖上的中国”奔袭巴黎纽约等地,近日更跳上了卢浮宫广场,让网友们大呼“征服世界”。

尽管纽约市民和警察对大妈们不太友好,甚至一度把他们请进了局子。但是这并不妨碍大妈们在卢浮宫前一展舞姿。报道显示,照片中,大妈们穿着鲜艳的玫红色舞蹈上衣,搭配紧身黑裤子,动作整齐地扭起来,跳得甚是欢乐,让诸多巴黎路人游客侧目。

从艺术上来说,广场舞尽管不是年轻人的时尚,更不符合当代小资的口味,但也绝不是低俗的艺术。它和当年的秧歌文化非常相似,都必须在广场上才能展现独有魅力。当年,黄土高坡的秧歌文化和十里洋场的舞厅文化构成了现代中国的两大文化象征,前者代表传统朴实的乡土文化,后者则是摩登现代的都市文化的代表。

从文化溯源上看,大妈的广场舞的确有不太适合现代都市的地方,譬如噪音等。这也是居民与大妈矛盾的症结。

广场舞和反广场舞之间的矛盾,其实不是个小问题。西方城市发展中美类问题并不突出。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传统让此类舞蹈很难大

规模流行,但是中国的秧歌文化传统,让广场舞很容易号召群众,特别是大妈们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的人,正是秧歌文化下成长的一代。因此,需要反思的是,面对这一代人的文化需求,我们的城市建设如何回应?

前几天央视曝光北京等地楼盘中,规划中的公用设施,譬如老人活动中心、游泳池、健身中心、绿地,甚至居委会等等多被挪作商业用途,城市规划建设如此,城市规划建设何尝不是?甚至连“广场”这个词都发生了异化,至少在上海说到“广场”一般都指某大型购物中心,并非是字典里的“广场”了。当下都市中的“广场”早已驱赶了大妈,不再是人们聚会娱乐舞蹈的场所,而仅仅是一个消费的市场。在一个房产商掌握话语权的时代里,在一个没有广场的城市里,广场舞尤为显得不合时宜。然而,当广场舞得如此稀缺,大妈们只能占领居民周边的公园、街道、绿地,甚至出国占领华尔街、卢浮宫,拥挤着推挤着,将这些不是广场的地方改造成广场。

“舌尖上的中国”如此逼仄!有网友说卢浮宫前的大妈广场舞是全球的巡回演出,我更愿意将她们看成一场行为艺术。这是对于极度功利化的城市建设的抗议,也是对现代都市忽视“诗意栖居”的抗议。 京文

清廉不清廉关键看“节点”

日前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透露,鉴于五一将至,“四风”问题将有所反弹,变相的公款送礼、公款旅游、公款吃喝、收受礼金问题可能会再次抬头。因此,有关部门将加大打击力度,同时在网络上设立曝光台,引导群众举报党员干部领导干部违规违纪问题,形成有力震慑,坚决防止反弹。(4月22日《人民日报》)

以往的腐败案件表明,节日期间是领导干部易被腐蚀的“高发期”。从近些年审理的职务犯罪和腐败受贿案件看,许多受贿行为大多是在逢年过节这个“节点”上。为感谢官员在平日间职务关系给予的方便或关照,行贿者就以五一、中秋、国庆、元旦、春节等这些“节点”为契机,给官员送“礼”,出现了送礼者堂而皇之,收礼者心安理得的不良风气,群众对“节点腐败”深恶痛绝。

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不断加大整风反腐败力度,特别是狠抓“节点防腐”,

大家有目共睹。比如去年根据不同“节点”,中央纪委监察机关出台不同的应时反腐规定:中秋国庆,禁止用公款送月饼等;元旦前,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春节前,明令禁止用公款购买烟花爆竹、烟酒、食品等年货……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严格廉洁自律。这一反腐新招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和震慑力,使“节点”送礼歪风大为收敛,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收到实效,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焕然一新。

由此可见,清廉不清廉,关键看“节点”。遏制“节日腐败”,人人有责。严防节日腐败,是对国家、人民、社会、家庭和干部负责,也是“治病救人”,把腐败消灭在萌芽状态的良策。为什么有的领导干部过节“节点”为什么一些别有用心者平时送礼很难,而过节时却能轻易如愿?这是因为复杂的社会原

因与传统文习俗所致,有些人把过节送礼当成“人情往来”和“感情投资”,长此以往,节日就成了行贿受贿的好时机。那些温情脉脉的“礼尚往来”和“人情交往”,恰恰是裹着“糖衣”礼仪的权钱交易,不断击中心一些意志薄弱的领导干部,他们纷纷倒在节日腐败的温床上不能自拔,直至身败名裂。

廉不廉,看节日。因此,各级领导干部都要防止“节点腐败”,应时刻牢记党的宗旨,率先垂范,秉公用权,廉洁自律。其实,从古到今都重视“节点防腐”。如大宋丞相包公有句台词:“清廉不清廉,官场年关看”。包公布衣打扮“抓现行”,常使贪官污吏目瞪口呆,心惊胆战;乾隆皇帝微服私访,常令大小王府年关大门紧闭,生怕有人送礼,丢了自己头上乌纱。而今党中央同样把“节点”作为反腐倡廉的“前沿阵地”,不管是谁,违法了都要受到党纪、政纪和法律的严惩。

“节点腐败”虽发生在少数干部身上,但它的危害不可小觑。这类毒化社会风气的“节点腐败”,成了难以医治的“社会痼疾”,严重败坏党风、民风和社会风气。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铁腕根治,铲除这一危害社会的“毒瘤”。笔者认为,根除“节点腐败”,不能靠节前抓一阵子,“临时抱佛脚”的做法要不得。今年“五一”前,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把“节点防腐”常态化,这不失为着一着“反腐好棋”。为防止一阵风,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节点腐败”,关键是要建立长效监督制约机制,逐步健全完善党内外部监督、人大监督、上下级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等监督制度,下大气力,从“节点”入手抓清廉,坚持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地抓下去,一年接着一年地搞整治,对“节点腐败”问题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抓住防腐祛疾的关键点。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确保干部队伍风清气正。

焦豫安